

巩天民传略（初稿）

（1900~1978）

王立中

沈阳音乐学院

一九八三年九月

巩天民同志是原辽宁省付省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四届代表，全国政协第一、二、三、四、五届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付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

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八年因反对党内“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而自动退党，但他仍坚持革命斗争。“九一八”事变后继续为党工作。一九三五年以反满抗日罪被捕入狱，出狱后，一九三七年又和党取得联系，在敌占区继续参加斗争。一九四六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我军撤离沈阳时，党把巩天民留下，以志诚银行总经理的身分，从事党的情报工作，一九四七年十二月被国民党特务组织以“共产党案”逮捕，沈阳解放出狱。继续以高级民主人士身分从事党交给的特殊任务。一九五六年任辽宁省付省长，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横遭诬陷，残受迫害，于一九七八年十月二日含冤逝世。

青少年时代，在探索中前进

巩天民，名殿魁（奎），一九〇〇年八月十日，出生于河北省临榆县山海关西关一个自耕农兼土产商的家庭里。他出生时正是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清政府腐败不堪，摇摇欲坠，民不聊生，^暗无天日，真是“生逢国难，全家惊恐”。（1）

巩天民自幼家境贫寒，由于父母生活节俭勤奋经营，家庭经济有所好转。九岁入山海关鲁氏学馆（私塾）读书，那时还奉行科举制度，学习八股文。后入山海关汉英文专门学校读书。这时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已在他家乡南海长期驻军，山海关一带人民过着奴隶般的生活，日帝欺压百姓，中国官吏不敢管，他目睹此情此景极端愤慨，在他幼小心灵中埋下了反帝反封建的种子。

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以双重压榨，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他家也随着逐渐衰落。一九一六年他孤身一人背井离乡，到奉天谋生。经他表舅介绍，到东三省官银号开设的公济平市钱号当练习

（1）、见巩天明《自传》手稿 201页

生(学徒)，三年满徒后让他从事工商业放款业务。主要任务是了解各行各业的生产、供销、经营、管理等，然后进行分析，为钱号放款提供信息，共干了五年。

在这段时间里，由于他接触到各行各业，深感自己知识不足，他刻苦学习，孜孜以求。一方面学习银号的业务，一方面流览了很多书籍。关心国事，他曾读过梁启超著《饮冰室文集》，当读到“新民篇”时，他感到很新鲜，有启示，于是立志要做新民，把自己带有封建色彩的名字“殿魁”改为“甸奎”，起个号叫天民。(1)以示反封建，要求民主、平等。他认为中国要独立、富强，必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制度，每个新民要从个人有知识入手，接受新文化”(2)于是利用业余时间到奉天英文夜校去攻读英文，使自己能阅读英文刊物，学习外国文明，以开阔眼界找寻真理。为挽救祖国的贫困衰败，在探索中前进！

投身革命，参加中国共产党。

巩天民虽然奔波于金融界，可是国内外的革命风暴却不断地撞击着他的心田。在辛亥革命，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我国“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下，他懂得了反帝反封建的道理，“封建军阀都是以帝国主义为后台”，因此“反对封建势力，必须同时反对帝国主义”。他认为国家怎样才能强盛呢？就是要有一个“自由、民主、平等的社会。”(3)

这时伴随着各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同时进行文化侵略。在奉天创办了基督教会，设立基督教青年会，它以办“慈善事业”的面貌出现，宣传基督教义，搞帝国主义文化渗透，借以麻痹中国青年。



(1)，见巩天明《自传》手稿202页

(2)、 “ ” 202页

(3) “ ” 202页

由于中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封建势力无权过问青年会的活动，这样有一些进步人士，就利用这一阵地进行反帝爱国活动。巩天民参加了基督教青年会，他在这里教过初级英文班，扫盲识字班，以唤起平民的觉醒。

一九二一年奉天一部分爱国知识分子有阎宝航（任青年会总干事），张韵铃（又名张治、任女青年会干事），吴竹邨（任奉天第四小学教员），高子升（任满洲银行行员）、郭钢（又名郭尊三，任官银号职员），何松偈（任东三省银行职员），巩天民（任公济平市钱号职员），还有苏子元（任青年会文书）等。他们以奉天基督教青年会为基地，组织了一个“礼拜三座谈会”。每周星期三晚间聚会，他们在一起阅读报刊杂志，评论时事政治，探讨五四运动以来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议论国家的命运和青年的出路。他们提倡民主，提倡科学，主张文学革命。在这里形成了奉天青年漫谈新思想、新文化，要求民主与科学的中心。新文化运动虽属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革命范畴，它不能给中国指出正确出路，但它是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开端，激起了人们追求真理的愿望，为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扫清了道路。

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非常关心各地人民的革命斗争，曾派人到东北来宣传马列主义，为在东北建党作了准备。在党的影响和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一九二三年参加“礼拜三座谈会”的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在高子介的带动下开始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他们学习了日文版的马克思著《资本论》及河上肇、片山潜等日人编写的有关社会主义著作。同年春，郭钢到广州去参加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会议回奉，带回不少广州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编译的关于共产主义的书藉，有《列宁传》、《共产党宣言》、《新俄游记》，还有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到政权之路》等。起初是由苏子元、高子介、吴竹邨共同研读，后来在“礼拜三座谈会”的成员中进行传阅，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书藉多起来了，研究的问题也越来越深入，许多成员

的思想观点发生了新的变化。到一九二四年实际已形成以高子升，苏子元、吴竹邨、郭钢、阎宝航、何松涛、巩天民等人参加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他们不只是在小组里学习，而且向周围群众传播马克思主义，他们同情劳动人民，积极寻找共产党。

一九二四年春，党中央派韩乐然到奉天来开荒（指到奉天建党）了解奉天的革命活动，寻找先进分子，这时韩乐然来到青年会参加活动，并与文书苏子元在接触交往中两人交上了朋友。从此苏子元经常收到中国共产党出版的刊物《响导》《中国青年》及其它小册子，因青年会是外国教会办的，邮件不受当局检查，为我党在东北传播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方便。苏子元收到后就按期分发给巩天民等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成员学习研究，也发给学校和社会进步青年一部分进行传阅和学习，在秘密地传播马克思主义（见苏子元写的材料）。于是相继在进步青年中又出现了很多宣传新思想的团体，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奉天的传播，使学生、工人运动有了新的发展，为在奉天建立党组织作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

奉天青年宣传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情况，通过韩乐然报告给党中央，党中央把情况介绍给北方区委。一九二五年中^共北方区委李大剑同志派任国桢（共产党员，北大俄文系毕业生著有《苏俄的文艺论战》）到东北加强党的工作。任国桢也经常到青年会来参加活动，并和苏子元交上了朋友。后经苏子元介绍任国桢和韩乐然相识。

自从任国桢到奉天，在青年会中接触到一部分先进人物，大家对任的印象也很好，任为人诚恳，学识渊博，巩天民很羡慕他，也愿意接近他。当知道任国桢是党派到奉天来搞地下工作的，巩天民积极支持他的工作。巩天民等人通过关系，把任国桢安置在奉天大南门里文华阁纸庄寄居，离青年会很近，便于任国桢到青年会开展党的工作（见自传204页）。从此在党的领导下，奉天掀起了声援“五卅”惨案的爱国运动，于一九二五年六月十日，青年学生举行了前所未有的罢课斗争，亦称“六十”学生运动。当时巩天民组织一些商民也参加了“六十”运动，带动商民反对帝国主义，抵制日

货的斗争。这时整个奉天布满了干柴烈火，很快就形成了反帝爱国运动的高潮。

在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面前，奉天军阀当局极为恐慌，为了扑灭学生运动的烈火，命令各大、中学校学生提前放暑假，规定学生不准留校一律回家，并派军警到各学校去监视，警戒和巡逻。党为了使学生的革命烈火不被扑灭，不使反动当局分散学生的阴谋得逞，将计就计，组织进步学生在暑假回家路上分赴各县进行反帝宣传，并利用青年会暑期举办夏令会的惯例，任国桢、苏子元、阎宝航研究决定在青年会办“暑期大学”让一部分进步学生住进青年会，以青年会为掩护，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从中扩大党的影响，系统地传播马列主义，这一决定受到各方面进步人士的支持。参加学习的成员有声援“五卅”运动的代表，各校进步学生和社会进步人士共二十余人。任国桢亲自讲授唯物史观，上海学联派来的吴晓天讲学生运动，陈日新（又名陈涛，留日回国）讲社会发展史。巩天民积极地参加了“暑期大学”学习，经过学习、讨论和辩论，党组织进一步了解了每一个学员的思想、观点、立场，从中物色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先进人物，吸收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青年团组织里来（也叫C P、C Y）。巩天民由于思想进步，工作积极，接受党的领导，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员。同年八月建立了奉天市第一个党支部和青年团支部。任国桢为中国共产党奉天特别支部第一任书记，吴晓天为团支部书记。隶属设在哈尔滨的满洲省委领导。当时被吸收入党的还有高子升、吴竹邨、李跃奎、张光奇、周东郊等人。从此，奉天的革命斗争在基层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开创着革命的新局面。

巩天民入党后，为了便于活动，把在各银行工作的几位党员组成了一个党小组，活动地点在日本帝国主义开办的满洲银行，在这里开会、讨论形势、布置工作任务，苏子元写好宣单，在银行里印刷。他们在这个虎口里活动，以日本银行为掩护，很难被人发现。巩天民除从事党交给的工作外，还积极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学习政

治经济学。他联系到当时帝国主义直接到中国开设银行，吸取中国资金，英国的汇丰银行、美国的花旗银行、日本的正金银行、朝鲜银行等都在中国发行流通他们的纸币，并开始在中国开设矿山、工厂、铁路掠夺中国资源，剥削中国工人和广大劳动人民。他更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才有出路”。（1）见巩天民自传207页）

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时期，中共奉天特支，积极贯彻党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决议，派高子升、吴竹村、巩天民等人在奉天的文汇中学（教会办的学校）同钱公来（是筹建国民党奉天省党部的负责人）联系，曾和钱谈过几次国共合作的问题。中共奉天特支决定，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可以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这样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在奉天建立起来了。奉天也和全国一样，一九二六年五月国民党蒋介石提出“整理党务案”破坏国共合作，进行反共活动，国民党奉天省党部也要加害共产党员，中共奉天特支决定，一部分暴露身分的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粉碎了国民党妄图危害共产党员的阴谋。

在这一时期里，巩天民几易职业，先后在金星保险公司当经理，郭松令开办的裕民银号任放款主任，后郭松令被张作霖处决，银号官没，他又会同亲友们出资开设世成庆货庄，在沈阳专门作存放款业务。巩天民被资方推举为代经理。在这时二十六、七的巩天民，他虽然没有资本，但已成为沈阳市金融界熟悉业务、有才干、有能力、初露头角的、私人钱庄的头面人物，这个社会地位更有利于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宣传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军阀祸国民”的罪行。为了摆脱敌人的注意，有些会议就在他家的住室和银行的办公室里召开。满洲省委书记吴理石从哈尔滨来到奉天传达国内外形势时，就在银行的办公室里进行。为了不被敌人发现，经常几易秘密接头地址，在小河沿（现在的万泉公园）凉亭、盛京施医院（现在的肿瘤医院）树林内、体育学校、南塔跟下……。这时党在奉天的工作有很大发展，有工人运动、学生运动、社会运动。

当时奉系军阀张作霖，对人民的搜刮更甚，购买军火，修飞机场，开兵工厂，准备内战。人民在军阀统治和帝国主义的侵略的双重压迫下处在水深火热之中，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因此奉天的革命斗争更加艰巨。巩天民在党的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开展党的地下工作。

在白色恐怖下，奉天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由任国桢换为吴晓天又换上杨韦坚，后来由高子升代理。党的领导人频繁更换对开展工作很不利。一九二八年春满洲省委书记陈为人亲自领导奉天支部的工作。陈为人工作积极，雷利风行，但由于受党内“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也曾搞过“空想暴动而不能暴动”的盲动主义错误。（见满洲省委烈士传第六页）到奉天后就筹备武器，准备暴动，并布置党员散发传单，党员登记要用真名实姓，用真工作单位。巩天民对上述做法有不同看法，但仍执行党交给的任务。事后向陈为人提出意见，他认为这样做太冒险了，也容易暴露。提出“暴动要看效果牺牲要有代价，不能盲动”。陈书记坚持说：“党内有铁的纪律，有决议就得执行”。巩天民认为党内不讲民主，决议要从实际情况出发。陈书记由于与他有分歧则大发脾气，并提出：“不服从决议就得退党。”巩天民当时很气愤，一时冲动就写了一份退党申请书。（见巩天民《自传》209、103页）但不久巩天民又后悔了，感到“不该意气用事，犯了自由主义，把退党的政治大事，当成自由行动”他感到离开组织孤独了，对政治斗争缺乏明确方向，深感苦闷。但又爱面子，不肯公开承认自己是错了，所幸的是，有几位党员还能谅解，经常见面，能随时请教。他虽然组织上离开了党，但思想上是向往着党，他没有躺倒，继续参加革命活动。在青年会中联系进步分子搞民主运动，组织“周契会”联络友情发展社会运动。当时不少进步人士和夫人参加这些活动。他还鼓动和参加了奉天市人民提倡国货，抵制日货和揭露日本浪人贩卖鸦片和海洛因等惨害中国人民牟取暴利的反日爱国活动。一九三〇年三月两次在小河沿

体育场焚烧鸦片，烟雾遮天，人人称快，长了人民的志气，灭了日帝的威风，巩天民在阎宝航、车向忱的领导下，为抗日爱国做了大量的宣传和筹备工作。

反对日帝侵略，身陷囹圄。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寇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张学良奉蒋介石的命令“不许抵抗”大批东北军撤到关内，使我国东北一千三百万平方公里的锦绣河山践踏在日本侵略军的铁蹄之下。巩天民看到“日帝侵略军荷枪实弹，阔步街头，如入无人之境，真是触目伤心呀！”（见《自传》211页）后来在日寇的卵翼下酿成成立伪满洲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能听任日寇摆布甘当亡国奴。巩天民同青年会和盛京施医院等单位一部分爱国人士刘仲明（现为省政协主席）刘仲宜（已故）、毕天民（已故）等积极进行反满抗日的活动。他们散发传单，向市民宣传“不要上日本鬼子的当，成立满洲国，就是永远当亡国奴了。”（见《自传》212页）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六日日本著名的特务，驻华北的特务机关长到奉天，当奉天市市长，并进而策划成立所谓的“满洲国”。日寇逼迫商民去日本领事馆请愿，要求建立“满洲国”并簇使商民搞“促进建国大示威”，还强令商民挂伪满国国旗。在这民族危亡关头巩天民等一些爱国人士他们组织起来，抵制成立“满洲国”巩天民把自己的家属也组织起来，他的夫人呼泽生（呼重恩）和呼的妹妹给他抄传单为他站岗放哨，转移和收藏秘密材料。有一次传单连夜写好后，巩天民化上装临走时对他夫人说：“如果我不回来，不用去找我！”（见呼泽生回忆二）就这样他冒着生命危险把传单从商民开会的后门撒进去，警告商民“不要被日寇所利用，成立满洲国关系到民族存亡的大问题。”（见《自传》212页）这样商民看到传单就哗然而散去日寇的阴谋没能在商会中得逞。他们还投书天津大公报揭露日寇侵略东北的罪行。

一九三二年夏，他代表奉天市文教、工商、银行等各方面人士到处奔走呼吁，开展救国运动，并到北京去见张学良，带去他们友谊小组成员刘仲明、刘仲宜、巩天明、张颖冷等人写的一分书面材料上书张学良面陈敦请张、联络中国真正抗日的各方面力量（指共产党）及爱国人士、爱国群众，率领东北健儿打回老家去收复失地。东北民众，引颈望之（见《星火》第二辑264页）小组成员都在上书上签名盖章。这封信由巩天明面呈张学良，并劝张学良抗日。张学良很受感动。一九三四年他又去武汉找边业银行经理韦梦龄，韦刚从欧洲回国，希望韦协同抗日。因韦组织四维学会拥护蒋介石，未谈成，愤而反回。在回来的路上见到了阎宝航，听说阎宝航、杜重远等人在北平组织了东北抗日救国会，他和救国会取得了联系，并资助阎宝航活动费500元。通过阎宝航等人的介绍，他认为东北的抗日义勇军是真正抗日的是受共产党的地下组织领导。他就决定援助和支持东北抗日义勇军。当救国会和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宋黎、张雅轩（张金辉）来奉天时，巩天明、刘仲明等为他们筹备经费，给他们做掩护，帮助他们宣传抗日，并给他们提供各方面的方便条件。这时他和宋黎成了好朋友。宋黎讲：“只要有机会去沈阳，我便到巩天明任职的边业银行（是世成庆）或他的家，找他借书看，那时我不知道他是中共地下党员，但我们有共同语言，他经常借给我一些很开脑筋的书。巩天明常常似无意实为有意的在借给我的书里夹几页抗日宣传材料，使我受益不浅。”（见宋黎《革命回忆录》第二集“记九一八事变前后”p41）他们这个友谊小组，还决定从每人每月工薪中拿出百分之十作为公共的储蓄，叫“卫生会”为救国自救，做为资助接济东北义勇军的经费和医药方面的援助，也用此钱救出被捕入狱的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也提供过部分共产党搞地下工作人员之经费不足。呼泽生回忆：卫生会的款项也曾营救过监狱中的人，那叫从监狱买人。记得天明同志说过一位女同志由大连下船即被日特逮捕，押在沈阳，就是用卫生会的钱买出来的（见呼泽生回忆一）他们每月把钱收上来，立一个分户

帐，由巩天民代管。由邵信普保管捐款。当时他们认为要抗日救国就得长远计议，决心奋斗图存，决不做亡国奴。

巩天民继续参加青年会一部分董事、干事、会员组织的抗日爱国活动，他们对河山变色，国土破碎的情况，都怀着忧国忧民的沉重心情，而自发地组成小组，每次在刘仲明家聚会都“各饮苦水一杯，以励卧薪尝胆之志，以示待机报国之诚，悲愤之情，充于五内”。

（见《星火》第二辑263页）一九三二年国联（指国际联盟简称）组织调查团前来远东对日本侵略作实地调查。这个调查团是由英、美、法、德、意五国的成员组成，团长是英国人李顿，亦称国联调查团或称国联李顿调查团。这个调查团虽具有欺骗性，可是这些爱国人

士为了能有地方申述日寇侵华罪行，他们立即在刘仲明家里召集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刘仲明、刘仲宜、张敬琨、巩天民、邵信普、张查理，毕天民等，商量如何利用这一时机行动起来。最后全体一致决定，集中精力搜集日寇侵略东北的事实和欺人之谎言，用以揭露日寇侵华罪行。还决定了工作的目的和方向。搜集材料的原则以及分工办法，一致认为必须趁着日本特务对于他们未加监视和戒备的时机，迅速完成任务。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把日军直接给伪省政府的命令。通过省政府管卷的爱国分子，在晚间下班时将文卷偷偷带出，当晚拍照完，次日再带回去。巩天民又利用他是商会负责人的身分冒险夜入商会“窃取”伪市政府函谢商会派人参加庆祝建立伪满洲国游行，加大了游行队伍，“送赏金千元”的原函，赶晒成兰图，再送回去。他们还夜间偷揭布告，偷拍机要、照片，克服了重重困难。用四十天的时间整理编写成册，用八天时间打印完了。材料的内容大致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各种证据汇编，将全部搞到的证据编上号，贴在一个簿子上。第二部分是各项证据的详细说明书。为了便于外国人阅读，由刘仲明、张查理和巩天民负责，将材料译成英文，装订成册，包上黑缎子面，并绣上“Truth”（真实）二字，订了正副两本，怕正本被日伪抄查去，又搞了一个副本，为了避免副本丢失，而深埋地下。为证明材料的真实性，小组

的每个人都签上了真名实姓。

当李顿调查团来奉时，他们千方百计，巧妙地躲过警宪的监视辗转相托，把材料交给了李顿。这些爱国人士那能知道苦心整理的材料，又落入帝国主义之手。帝国主义是一个鼻孔出气的。李顿得此材料后，就摘出这个材料的一部分纳入“国联调查报告”中公布于世。“报告”指出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不是“此一邻国以武力侵犯彼一邻国边界的简单案件。”而是有“赤色危险”的复杂问题（见三联书店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帝国主义侵华文件选辑》第138页）“报告”反映了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一方面不甘心日本帝国主义独占中国东北，另一方面又确定日本对东北进犯是侵略中国，并企图日本成为反对苏联的急先锋。实质是既不承认日本侵略东北一手泡制伪满洲国，又建议东北成立“自治政府”由各帝国主义国家来控制，其中日本人占重要比例，在东北组成一个特别宪警队，由外国军官指挥。至此，国联调查团代表各帝国主义利益的阴谋目的完全暴露出来了。尽管李顿报告书结论是偏袒了日本，但没满足日本侵略东北的野心，遭到日本的反对，日本代表退出国联会场，进而宣布不受国联约束，退出国联。伪满洲国的傀儡统治已为既成事实。

由于《国联调查报告》在日内瓦发表，在“报告”的末节中有这样一段话：“本团在中国东北奉天时，曾得到一些大学教授、教育家、银行家、医学家等人士的明确意见及各种有真凭实据的具体材料，证明奉天事件是无因而至，而满洲国的建立，亦非出自东北人民的自由意愿，也不是民族自决。”这里指的就是送罪行材料的那些人。日帝怀恨在心，秘密进行侦察，掌握了这些整理材料人的名单。于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二日一夜之间，同时发动了大逮捕。奉天凡有外籍人员的机关：如青年会、施医院、教会、外国烟草公司外国洋行爱国的中国人以及学校、银行、医药界的爱国人士，还有锦洲、吉林、青年会里的爱国人士均同时被逮捕。奉天小组除邵信普、张韵冷两人外，其他如巩天民、刘仲明、刘仲宜、张查理、毕

天民、李宝实、刘国华、史上述都拘押在奉天伪警厅。

十月十三日清晨，敌伪警宪人员闯进了巩天民的家，进行了大搜查，搜走了大量的书藉和材料。当时写字台上有一分头天晚上送来的材料，巩天民乘敌人不备，用胳膊肘拐在地下，用脚踢到写字台下的乱纸里。他还唯恐那本由他管理收藏的“卫生会”分户帐，被敌人发现，落在敌人手里，那将酿成一场更大的祸患，帐本上的百余无辜同志要被捕坐牢。当敌人问他“和家里还有什么说的没有？”他急中生智，以假借向夫人交待日后生活事，从衣柜里拿出“卫生会”帐本，当面向呼泽生讲：“以后柴、米、油、盐帐，让老大记下去（指他的大儿子巩国本，没暴露他夫人有文化）。夫人知道家里没有生活帐，一定是一个重要东西，就赶快接过来，夫人怀抱五儿，正发高烧，哭叫不止，巩天民马上说：把孩子抱出去！”呼泽生把帐本同孩子包在小被里，抱出去。这时敌伪警宪嫌巩天民啰嗦，怕耽搁时间，影响逮捕其他人，也没功夫看他什么“帐”就紧催他走了。巩天民被捕后，呼泽生意识到写字台下一定还有重要材料，夫人擦干眼泪，忙到写字台下寻找，找到一分材料，夫人怕再来收查，就把材料和帐本藏在煤堆里。天亮，张韵冷（张泊）得知大逮捕的消息，冒险到巩天民家去，急问呼泽生，那本帐被警宪收走没有？呼泽生悄声说了逮捕的经过，并到煤堆里翻出那本帐和材料，让张韵冷带走了，当天进行了处理。（见呼泽生回忆三）

巩天民在伪警察厅被拘留一周后，把他和刘仲明、刘仲宣三人押到日本宪兵队。他们胸前挂着一个白布条写着“反满抗日犯”进行了刑讯。他们受到惨无人寰的酷刑，如疲劳审讯、电波通恼、灌辣椒水、剔刺指甲、滚钉板、卧短凳等名目繁多的法西斯刑法，甚而把刘仲宣折磨到疯颠。当时宪兵队问巩天民“是不是反帝大同盟成员”，“是不是共产党”，“你家里为什么有不少有关共产主义的书藉”。他当时本着一个原则，就是没抓住证据的事一律不承认。关于社会科学和经济学书藉一事，其中有一些是日本左派著的，他说是为了银行业务需要在研究经济学。只有给国联调查团送交日

本侵华罪行材料一事，日寇已掌握，所以承认由他整理了材料。后经朋友多方营救，被保释出狱，共监禁了四十九天，以“思想要视察人”载入日本警宪册中。松浦登司法主任负责督视巩天民，他虽然出狱，可是行动是不自由的，要受到各方面的监视、跟踪和随时传讯，如有可疑之处，还有再次被捕的可能。巩天民是一个半自由人，对日寇万分仇恨，想寻找斗争的道路。（见巩天民写的“敌伪时期被捕的事实经过”第904页）

利用合法身分，从事党的秘密活动。

他出狱后继续从事金融事业，五家钱铺合并，组成志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是山西五家，财东代表曹章甫也是董事，巩天民是董事兼经理，因规定董事得有股本，巩天民没有钱，曹章甫赠与他五千元，又借了一点钱算入了股，才当了董事。巩天民熟悉金融业务，在他领导下原定五年还清债务，可是只用一年时间使志城银行还清债务，银行又复发了，再不用担心破产了，在社会上站住了脚，所以各股东都非常感激巩天民。巩天民在志城银行是有职有权的，他利用这个权利任用了一些自己人（共产党员）如燕又新（共产党员）任总务科长，他以民族资本家的身分掩护同志们从事反帝爱国的斗争。

一九三七年抗战全面暴发，芦沟桥事变后，日寇遂侵占全中国，这时，日寇对东北的控制更严了，东北成了日寇入侵关内的经济、政治、军事的大本营，兵役、劳役、苛捐杂税一股脑的压在东北人民的身上，东北人民在日寇法西斯统治下，惨遭蹂躏，过着牛马不如的亡国奴生活。巩天民虽然被日伪逮捕坐过牢，但没有畏惧日伪的高压手段。为了反满抗日不怕坐牢、杀头，为了国家的兴亡，置个人和家庭安危而不顾，继续组织力量，进行抗日活动。

就在这时，回东北的一些留英、美、日的学生有几十人，他们

自发地组织了东北抗日救国会，后成为党领导的东北抗日同盟。领导人是丁宜（共产党员又名张丁一、丁执中是留日学生）他们打入敌占区各行各业，了解敌人的政治、经济情况，为中国共产党了解东北敌军情况提供材料。这里的多数人向往共产党，经过丁宜向晋察冀边区联系，锄奸部长许建国接待了他们。听了他们对东北情况的介绍承认他们的组织是革命的组织，要求他们继续进行抗日活动。(1)

这时，张为先（又名郑子多，中共党员）先后由英国到日本留学已回奉天。党组织准备让张在奉天开展党的情报工作。当时想物色一个社会地位较高，能接近日伪上层的人物，了解日伪政治、经济、军事机密。他们认为巩天民最为合适，但巩是被日寇监视的人，又怕暴露，于是张有意识的到志城银行来找巩闲谈，分析国际形势，中国前途、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和世界上无产阶级革命联合起来等问题。也谈到在英国时张和何松亭的关系。张偷偷告诉巩，由何松亭介绍张参加中国共产党，张在英国时从何松亭那里知道了巩天民的历史。经过一段思想交流，张对巩有了进一步了解，后来党的秘密组织又考查了巩天民，他早期入党、脱党的情况，被日伪逮捕的表现和出狱的经过，没有投敌变节行为，组织上分析认为，巩还是比较可靠的人，政治上没问题，应在党的工作中继续考查，于是张为先公开和巩天民谈了。张要在东北进行党的敌占区情报工作，希望巩天民参加。巩天民向张表示愿意并高兴为党工作。但这时张没有社会职业诸多不便，于是便把张为先安置在志城银行当监察，张既是有职有权的银行股东代表，又不负担具体业务责任，可以有时间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以银行为职业来掩护张为先。从此巩天民经常从银行、工商界及一些社会活动中了解和掌握敌伪政治上统治和经济上的掠夺及其他方面情况，报告给张为先由张为先再报告上级，他们互相配合的很默契，党的工作很快就开展起来了。(2)

一九三七年冬，经张为先的介绍巩认识了在奉天做党的秘密工作的

(1)、见陈钟回忆笔录

(2)、丁宜回忆，见巩自传217~218页

领导人丁宜（是实业银行的总务科长）在丁和张的领导下，志城银行内部，组织了一个读书会叫“觉社”实际是党直接领导的外国秘密情报组织。参加人有巩天民、燕又新（余谓）郭尊三、齐贯一等，他们主要是学习马列主义、经济学、社会科学、国内外形势和党的刊物。为了不被敌人怀疑，经组织同意，这些人可以利用各种机会和条件打入敌伪内部去，就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丁宜、张为先、巩天民等都参加了协和会。（协和会是敌伪打着日满亲善的幌子掠夺和屠杀中国人民的别动队）巩天民还兼任北关区长（因家住北关）还参加了日本特务机关外国组织“一心会”，打入敌人内部，以掩护自己的秘密身分，以利掌握更多敌伪机密情报。巩天民又是金融知名人士，能接触敌伪上层，他不但能了解到奉天的情况，他还能利用工作和联系业务的机会到伪满国都新京（现长春）去，通过和伪满大臣及日本财团的接触，了解核心机密情报，如敌伪的经济、政策——财政金融、贸易，日本对东北统治的做法、敌伪组织形式等等，还有利用奉天商业公会组织“华北观光团”的机会，进一步了解到北平、天津、济南、青岛、承德、大同、张家口的政治、经济军事情况汇报给晋察冀边区。巩天民这段为党工作的态度是积极的，每次交给他的任务都能顺利完成。（1）

一九四二年，日寇为了进一步垄断东北经济，发展日本资本主义经济，提出东北民族资本各行业搞组合，实质就是化零为整、合并、缩小，便于日寇控制我民族资本，强令志城、实业、世合公等银行合并，经改组三银行，统称志城银行（大志城）。其他两个为分行，原实业银行股东陈楚财为董事，曹章甫为付董事、巩天民为董事兼总经理，麻仲芳为常务董事，张为先为付经理，燕又新为总务科长，后来张为先、燕又新调到北平工作，把丁宜调到志城银行当总务科长、兼管人事。“觉社”继续在志城银行活动，当他们学习和汇报工作时，一般在志城银行二楼，一进二楼有茶房（即门卫）看守，来人要通过茶房联系才能进来办事，给“觉社”活动造成了良好条件。

XXXXXXXXXXXXXXXXXXXX

（1）、见丁宜回忆笔录

一直到四三年“觉社”撤销，成立了晋察冀东北救亡总会，负责人是丁宜，总会的任务还和觉社一样，继续从事情报工作，志城银行就成为党的秘密情报组织的重要核心和活动的主要据点。在这里不只搜集情报，而且开展了团结朋友，孤立敌人打进来的人。直到抗战胜利， 巩天民利用志城银行先后共掩护了九名共产党员，安全地、胜利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同国民党斡旋，再次坐牢。

一九四五年五月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已基本结束，法西斯德国被苏军打败宣布无条件投降。苏联为把反法西斯战争进行到底，苏联红军按照雅尔达协定宣布对日作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配合下，向日本关东军大举进攻，日寇不得不在八月十五日宣告无条件投降。这时沈阳（奉天）敌伪军尚未缴械，驻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还想逞兵作乱，人民惶惶不安，沈阳处于无人管的空白状态。这时丁宜根据党的指示，让在社会上有威望的知名人士陈楚财（志城银行董事）张星南（伪省议会议长）出来组织维持会，以维持社会治安，并让巩天民参加维持会，为负责经济工作的常委。维持会接收了伪奉天省政府，把伪省政府的经费存在志城银行金库里。八月十九日苏联红军飞抵沈阳，敌伪才彻底缴械投降。当时巩天民以维持会的常委、商会付主任的身分去见苏军驻城司令官，阔夫桐，要求苏军维持社会秩序，苏军成立了城防司令部，把存在志城银行库内的政府经费和志城银行的现金一併提走，为了稳定金融苏军出了一种红军流通卷，维持会和商会责成银行负责兑换伪币业务，具体工作由巩天民抽出一部分志城银行的职员地址在兴农金库进行，在当时起到了稳定市场，活跃经济的作用。并组织了中苏友好协会，会长白析清（现为全国中华医学学会会长）付会长巩天民，联合进步的知识分子，开展中苏友好活动。

九月六日八路军已到达沈阳，并通知维持会，这时维持会的负